

= 希爾斯
Edward Shils
= 傅鏗、孫慧民、
鄭樂平、李煜

Intellectuals and
Powers and Other Essays

[知識份子與 當權者]

「找到一條參與凱撒之事的道路」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

知識份子與當權者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and Other Essays

著——希爾斯（Edward Shils）

譯——傅鏗 孫慧民 鄭樂平 李煜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知識份子與當權者／希爾斯（Edward Shils）
著；傅鏗 孫慧民 鄭樂平 李焯譯 --
初版.-- 臺北縣新店市：桂冠，2004 [民
93]
面：公分.--
譯自：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and
Other Essays
ISBN 957-730-454-0（平裝）
1.知識份子
546.1135 93003725

08818

知識份子與當權者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and Other Essays

著者——希爾斯（Edward Shils）
譯者——傅鏗 孫慧民 鄭樂平 李焯
責任編輯——吳宗昇 劉彥廷

出版者——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231新店市中正路542-3號2樓
電話——02-22193338 02-23631407
購書專線——02-22190778
傳真——02-22182859~60
郵政劃撥——0104579-2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廠——海王印刷廠
裝訂廠——欣亞裝訂公司

初版一刷——2004年6月
網址——www.laureate.com.tw
E-mail——laureate@laureate.com.tw

© 1972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4 by Laureate Boo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57-730-454-0 定價——新台幣450元

導 讀

顧忠華／政大社會系教授

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度，「知識份子」這個社群，可能被稱譽、被欣羨，但也可能被詛咒、被迫害。他們會有這麼不同的際遇，不盡然來自於本身的特質，倒有一大部份是因為「知識份子」與「權力」之間，似乎存在著一定的「選擇性親近」，而隨著不同社會與不同時空背景的變動，這一層親近的關係有時成了「晉身階」，有時卻又容易使特定成員淪為「階下囚」，引來許多造化弄人的感嘆。

知識份子之所以成為一種「類屬」的概念，流傳著幾種說法，一般認為知識份子一詞的起源，和帝俄時期扮演社會良心角色的一群文藝青年密切相關，這批主要活躍在波希米亞地區的知識菁英，一方面過著自我陷溺的生活，另一方面將解救人民的苦難視作已任，追求精神上的昇華與救贖，他們的種種行為模式，日後被描述為知識份子的「原型」。不過，本書作者希爾斯則是明白表示自己在年輕時代閱讀到曼海姆和韋伯的著作，幫助他確立了基本立場，用來批判 1930 年代的共產主義知識份子。在他看來，德國威瑪共和國覆滅的原因，至少有一部份責任來自於當時

的知識份子對局勢的發展「鄙視和忽略」，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悲劇。

以西方這段歷史經驗而言，知識份子的確與各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形成過程密不可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莫不有一套言之成理的「論述」或「教義」，使得思想成為「信仰」和「力量」，而這套論述的生產與傳播者，非知識份子莫屬。剝除了這些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論述，現代的政治可能只剩下赤裸裸的權力鬥爭，可是光靠權力，能夠動員得了大批群眾、激發起澎湃的熱情嗎？

知識份子與權力的關係，在這裡出現了一種致命的漩渦，有多少歷代的革命家身兼知識份子的角色，又有多少當權者需要知識份子提供論述的服務，但當知識份子捲入權力的鬥爭中時，馬上會發現理論性知識抵擋不了「敵我邏輯」的貫徹，於是知識份子的獨立特性遭到了嘲弄與踐踏，特別是在極權國家裡，知識份子可能被送到「古拉格群島」，也可能被打成「臭老九」，再一次驗證「鳥盡弓藏、過河拆橋」的權力遊戲規則。

希爾斯本人顯然不太同意知識份子介入現實政治，這從他批評同情共產主義的學者「愚蠢、自我欺騙」以及反對六〇年代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可見一斑，類似的立論，坐實了他被貼上的「保守」標籤，而他也不以為意。較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本書中透露自己對於另一個極端——麥卡錫主義——的強烈反感，作為社會學家，他在偶然的機會參與了一群美國原子科學家發起的運動，從而見識到右派的麥卡錫主義者對科學知識份子的不信任與壓迫。基於這樣的親身經歷，他體認出「學術自由」幾乎很難得到一個穩定的地位，其重要理由之一則是「學術界自身對於它自

己作為大社會中的一個團體的自由漠不關心」，因此他呼籲科學家們必須關心公眾對於科學議題的看法，將科學知識對公共生活和公共政策的影響作更有效的結合，以爭取社會各階層對學術自由的支持。

他的這番論點頗發人深省，畢竟科學家如果成天只埋首在實驗室，很可能根本構不上作為知識份子的條件，當受到政治勢力莫名其妙的打壓時，才會警覺到與社會的隔閡。相對地，具備有知識份子特質的科學家們，反而可以針對社會關注的議題——如原子能的和平使用——進行公共溝通，並提供有別於官方的專業意見，形成社會進步的動力。希爾斯自己投入過《原子科學家簡訊》的編輯與發行工作，他自豪地形容這份刊物銷量雖小（約一萬五千份），但影響力卻很大，並透過國內外媒體的共鳴，將其「獨立、客觀和理性」的形象印刻到美國大眾之中。或許在回顧他一生所從事的事業時，希爾斯會認為：參與過「美國科學家運動」，是他在實踐知識份子的天職上最有意義的成就之一。

由這個例子來看，「權力」不見得只指涉到政治權力，事實上，若再回到時空的座標上，可以發現「知識份子」的定義也不斷改變。在十九世紀，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全世界加起來恐怕不會太多，而二十世紀可說是「大學」最為急速擴張的世紀，目前不只歐美國家，幾乎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以興辦大學作為培養人材的手段，加上所謂「知識經濟」的衝擊，二十一世紀對於知識普及的需求只會增加、不可能減少。「大學生」以往是「知識菁英」的同義詞，現在則多少呈現「通貨膨脹」的狀況，不再能自比為菁英；至於「知識份子」，過去比較限定在創造精緻文化的少數意見領袖，現在則在專業化與大眾社會雙重趨勢的夾擊下，陷入了另一種兩難困境：一方面因為各種知識的壟斷逐

漸打破，知識份子不再擁有詮釋文化的特權，另一方面由於大學生數量的成長，社會階層之間的知識落差縮小，知識份子似乎也日益「庸俗化」，不再能發揮鶴立雞群的效力。

面對這樣的發展，希爾斯倒不像有些保守到反動程度的學者般，一再抱怨大學的增長會使大學生素質下降，他採取較為中庸務實的態度，主張這種擴張代表高等教育機會均等理想的實現，也使更多的專業型知識份子被訓練出來，參與到政府行政或社會管理部門，與權力產生了新的結合，反而擴大了知識份子的影響力。他進一步指出，在美國，一場大眾生活的「知識份子化」已經展開，過去並不欣賞知識份子及其工作的政治、管理、經濟與軍事精英，積極參與了創立訓練知識份子的機構，並且接納他們進入權力圈子，其結果是使得權力「文明化」，靠向知識份子鼓吹的核心價值——平等、正義、尊重弱勢等等。

當然，希爾斯也不是天真地認為知識份子「滲透」到社會的主流位置後，可以完全改變權力場域的生態，一旦「政治、管理、經濟與軍事精英」遇到麻煩，可能重新激起知識份子心中「疏離的傳統」，這種傳統警告知識份子與當權者應該保持適當的距離，才能夠扮演好「異議者」或「批判者」的角色。希爾斯相信，即使知識份子愈益被納入有組織的機構中，所謂「無所歸屬」（或「自由浮動」）的獨立知識份子愈來愈少，但是知識份子社群實際上意味著一個「有效的行動體系」，無論傳統受到了何種扭曲，在各個專門領域以及整個知識界，一代代的知識份子總會將基本的模式傳承下來，並且維持一定的標準。他寫道：

「嚴肅的知識份子從來就沒有擺脫過來自於他們階層之外的社會階層的壓力，無論知識份子在經濟和政治中的作用如何，知識份子的任務始終面臨的任務是延續他們自身的傳統，盡他們最大的

力量發展它、分化它和改進它。」他接著表示，知識份子「始終必須與教會、國家和政黨，以及商人與軍人們做鬥爭，這些組織和人一直力圖招納他們為其服務，如果他們不屈從於誘惑和威脅，便應箝制他們的言行，乃至懲罰他們。當前的情況與過去大致相同，知識份子的職責也仍然相同：那便是服務於他們所發現和確立的準則，並在不放們正業的情況下，找到一條參與凱撒之事的道路。」

「找到一條參與凱撒之事的道路」的確道盡了古今中外知識份子的心聲，知識份子可能來自各行各業，或許與宗教的、文化的、象徵符號的、意識形態的領域最為相關，但是知識份子必定是以入世的態度，秉持某種理念來參與到世俗的紛擾。亦因此，另一位與希爾斯同樣關心知識份子現象的美國社會學家柯塞（L. Coser），特別用《理念的人》（*The Man of Idea*）^①作為他論知識份子的專書書名，以彰顯理念對於知識份子的重要性。柯塞所強調的「理念」，換成希爾斯，應該就等同於「傳統」，他不但在本書細數了知識份子的五大傳統，也曾經專門寫過一本《論傳統》，來釐清現代人對於「傳統」概念的誤解。這樣看來，希爾斯真正在乎的，是想檢驗這一種知識份子的傳統，是不是會在現代的情境下消失。從上面引述的文字推論，希爾斯應該還是抱持著審慎樂觀的心態，認為歐美的知識份子可以繼承薪火，不至於讓長久累積的資產一夕敗光。

相較於柯塞所著《理念的人》，希爾斯這本論文集似乎較欠缺完整的系統，他自承書中的論文大都是由未完成的片斷論述而成，但也代表了更廣泛、更融貫地研究知識份子的企圖。尤其在

①編按：本書中譯本已由桂冠圖書公司出版。

本書中的第三部份，作者將眼光投向新興的發展中國家，探討知識份子在印度、亞非拉等非西方社會所扮演的角色，這是一般西方學者不會特別關切的議題，而希爾斯能夠擴大他的關懷面，是值得予以肯定的。不過，讀者們在閱讀此一部份的時候，恐怕得「體諒」到這些論文寫作的歷史背景，因為其中的觀點大多是五〇、六〇年代流行的「現代化理論」，也就是難以避免帶有「西方中心主義」，將現代化化約為模仿西方制度的過程，連知識份子在各個社會的功能，也似乎都得先和自身的傳統畫清界限，再引進西方的「傳統」，才可能符合經濟發展、政治發展、社會發展的要求。這種想法的弔詭性，正在於西方的傳統被視為可以與現代相容，不至於妨礙現代性的進展，而所有非西方社會的傳統則沒有被賦予這種神奇的力量。於此同時，新興國家中執行現代化任務的知識份子，幾乎毫無例外被歸類為吸收西方知識與技術的菁英，他們究竟應該承接誰的傳統呢？

以今天「後殖民主義」的觀點來論，非西方社會的知識份子往往去認同殖民者，引致本身的文化傳統遭受到莫大的忽視與破壞，反省到這一點，希爾斯某些不自覺帶有西方優越感的觀點應該受到挑戰，畢竟非西方社會可能擁有屬於自己的「知識份子傳統」，並且在現代的情境下仍然發揮著重大的號召力量。譬如中國的士大夫傳統，在韋伯的《中國的宗教》一書中便有專章討論，雖然不見得能掌握到中國知識份子傳統的精髓，但至少點出了若干與西方不同的特徵，可以用來對照希爾斯對西方知識份子傳統的整理。至於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表現，更不盡然符合「現代化理論」對開發中社會知識份子的定位，需要慎重以對，才能避免過份簡化了知識份子現象的複雜性。

最後，就拿台灣做為例子，知識份子的「傳統」由於涉及到

「歷史記憶」的多元脈絡，呈顯出承接時的衝突。不同的時空、族群、階層、世代，都會影響到當事人對於「認同」的選擇，是日據時代的統治者或是「台灣文化協會」？是大中國意識下的五四運動傳統？或是台灣意識高漲期的「本土化」論述？或許由於有了「選擇」的空間，現在的台灣正處在「傳統不穩定」的狀態中，甚至連「野百合學運」是不是形成一個知識份子傳統，都引起了各方的論戰。從台灣經驗中唯一能肯定的，是大家不必擔心知識份子這個「類屬」會在任何社會消失不見，因為我們看到，「參與凱撒之事的道路」在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的制度下，只會更寬更廣，而願意走上這條路的，仍是源源不絕，各位現在與未來的知識份子，祝福你！

原 序

I

在青少年時代，我曾廣泛地閱讀了福樓拜（Flaubert）、波特萊爾（Baudelaire）、艾略特（T. S. Eliot）和屠格涅夫（Turgenev）；以及索雷爾（Sorel）、泰納（Taine）和雷南（Renan）的著作。我也讀了宋巴特（Sombart）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 "Marxismus"*），以及一本由格耶（Kurt Geyer）所著，現在早已忘了的小書《德國工人運動中的激進主義》（*Der Radikalismus, in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1923），還有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的《政黨論》（*Political Parties*）和亨利·德·曼（Henry de Man）的《社會主義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Socialism*），以及一大批十九世紀政治論戰性質的文獻。這些作者促使我提出了：為什麼這些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和其他類型的知識份子（其中某些是偉大的，且所有的都非常有意義）對他們自身的社會，對統治他們的機構和人物，會感到如此的憎惡這一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

觸及到了這個問題，但在我看來，他們自身的行動所提供的證據比他們的論證和分析，似乎更有意義。在 1930 年代，我帶著反感目睹了美國和歐洲的激進知識份子蜂擁投入了他們各自的共產黨的懷抱和羅網。我親眼看到了某些不同輩份且受過最良好教育、最有教養的知識份子，以及許多素養稍遜的知識份子所表現出來的愚蠢、背信棄義和自我欺騙，這使我感到厭惡。新的知識份子組織創建了起來，為這些扭曲者提供場所；先前已建立的其他組織則被替代了，而知識氛圍中充塞著他們輿論一律的聲音。

到這時，我已經讀了曼海姆（Karl Mannheim）和韋伯（Max Weber）的著作：《學術作為一種志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幫助我確立了一種立場，據此可以批判 1930 年代的同路人——知識份子和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學術領域中的猶太人紛紛逃離德國，這使我有機會密切接觸了一批處於威瑪共和國某些典型活動核心和邊緣的人物。對我來說，威瑪共和國的十五期間似乎是一個輝煌的時期。我認為這個共和國絕大部分是由一些心地善良、至多是獨立無助的人所開創和維持的，而大部分時間裏受到容克地主（Junker）、企業家、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狂熱份子所帶來的挫折，並且被這個時期的大多數傑出知識份子所鄙視和忽略。在我看來，令人十分遺憾的似乎是，對於一個在如此廣泛地為知識份子帶來了巨大裨益的社會之覆沒，知識份子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威瑪共和國時期的知識份子以他們的才華，在某些情況下是以他們的天才，透過他們積極的惡作劇，討好似默認或贊許，而顛覆了一個原來可以是康莊的社會。自然，他們並不是唯一要負責的人。即便是他們更為敏銳，他們也不可能遏止各種事件所導致的巨大破壞：軍事戰敗和民族羞辱，通貨膨脹和失業，被蘇

共控制的德共殘忍操縱，民族主義派別的野蠻行爲、軍隊和公共事務系統的背信棄義。

二次大戰期間，我企望有一個多少更好一些的時代。我回憶起了羅梅恩斯（Jules Romains）的《懷著美好願望的人》（*Les hommes de bonne volonté*）和威爾斯（H. G. Wells）的《陰謀》（*Open Conspiracy*）；我想起了那些起著零散作用和催化作用的知識份子——亦即韋伯和曼海姆所說的自由漂蕩的知識階層（*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我並不認為這種情況是可能的，但我認為它是令人嚮往的。

戰爭剛結束，我便透過某些威瑪時期的朋友，而結識斯齊拉德（Leo Szilard）。在短期內，我們組成了一個兩人同盟；斯齊拉德組織並試圖控制一個巨大的兩人同盟網絡。他是一位令人欽佩的人，但卻是一個陰謀家，一個仁慈的陰謀家，較韋布夫婦（the Webbs）更為仁慈而古道熱腸，然而他終究是一個陰謀家。他視政治家為工具，而不是合作者。透過斯齊拉德和其他朋友，我參與了正在從機密的曼哈頓計畫（the Manhattan Project）中湧現出來的美國科學家們的運動。我幫助籌建了《原子科學家簡訊》（*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並得以目擊一批力圖影響政府政策的知識份子所做的巨大努力，他們並非為了挫敗或毀謗政策而存心過意不去，而只是要影響它。對原子能發展的國際控制以及對其民間發展的國內控制運動，給了我許多機會來考察和思索我那個原初問題，然而現在這個問題已精細多了。

從1946年起，我成了倫敦經濟學院的一位教員，在那裏我講授社會學。倫敦經濟學院在亞非兩洲常常被說成是最為重要的高等教育機構，而在那時，正像自從巴佛里奇爵士（Sir William Beveridge）成為其院長以來一直所是的那樣，它是一個激烈爭論

的舞台，也許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學府都更為活躍，更為多姿多采。它從當時大英帝國的亞洲部分吸引了大批學生，這些亞洲國家正處於組建英聯邦的進程中。在四〇年代，非洲學生開始日益大量地湧入這座學府，而西印度學生也開始跟上了。來自美國的學生始終構成了學院研究生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他們中的許多人是被托尼（R. H. Tawney）和拉斯基（Harold Laski）這兩位傑出社會主義者的聲譽所吸引來的〔這是在巴柏（Karl Popper）和歐克肖（Michael Oakeshott）聲譽鵲起之前。前者是與我同年來到學院的；而後者只是在1950年拉斯基去世之後，才來頂替他的位置的〕。羅賓斯（Lionel Robbins）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是學院中德高望重的人物，但是他們所輸入的中庸、保守、反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則是尚未進入學院的外在形象。

這時正好是大英帝國的瓦解已成落花流水之勢。邊沁（Jeremy Bentham）的空洞勸告「解放你的殖民地」最終成了政策的一部分。我見到了大量的「殖民地學生」，並且非常幸運地得以結識了他們中的一些人，這些人中一小部分自此以後已經成了傑出的學者，某些人則消失在他們國家的行政系統和最高學府中。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壓根兒就消失不見了；至少他們是從我的視野中消失了，雖然我希望他們能在其社會正在經歷的苦難中生存了下來，並活得不錯。我從前常到印度餐館去，那時他們在倫敦還不像現在這麼司空見慣；在那裏我與年輕的印度人同桌而坐。我試圖想像他們在那些將為之全力奮鬥的獨立社會中，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把他們想像為政治家、政府官員和新聞工作者，我想知道他們崇高而簡單的理想將是什麼，他們是否能夠克服那種反對派態度和烏托邦的大雜燴，這似乎是他們中大部份人所必有的^①。

我在倫敦廣泛接觸「新國家中的知識份子」的同時，我還在另一半盎格魯美國人生活中與美國的原子科學家運動保持著密切聯繫。芝加哥大學為該運動的主要中心之一慷慨解囊，《原子科學家簡訊》就在那裏出版，這使我的合作工作容易多了。我見到了為數甚多的科學家，某些是著名的，像尤雷（Harold Urey）、維格納（Eugene Wigner）、法蘭克（James Franck），當然還有斯齊拉德，還有些人那時的名聲還稍遜一籌，如拉賓納維奇（Eugene Rabinowitch）和辛普森（John Simpson），另有一些人則一生都沒出過名。所有這些人的公民責任感，以及對人類的善良願望，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邊緣地帶，此時還存在1930年代的同路人的繼承者，他們時時讓人們想起知識份子在政治中的犯傻本事和作惡的能力）。我在國際、國內控制原子能運動中，並在忠誠恐懼症和安全恐懼症開始襲擊我們的心靈之時，出席了眾多的會議；冗長的「彙報」，到全國巡迴演說，並時常在《簡訊》上著文。第一次麥卡錫主義佔據了我差不多十年的密切注視，直到它壽終為止。所有這些經歷以及伴隨著它們的研究，使我多年前對自己提出的問題時新如故。在1950年代早期，我開始講授關於知識份子的課程，並且寫成了我原初計畫的那本著作的初稿。我將其擱置一邊，以便更進一步研究這個課程。這部手稿主要探究了歐美文學界和學術界中知識份子的政治。其中有一章討論了〈無主權社會中的知識份子〉。那是基於一篇論文寫成的，論文則是在1952年左右關於貝特·霍塞里茲（Bert Hozelitz）論經濟發展和文化變遷的討論會上宣讀的。有人曾要我講授「知識社會學」，但我卻感到尚未準備充份，於是便轉而講授了「後發達國家中的知識份子」。這門課非常單薄，我拿定主意必須就它學習更多的東西，我意識到，我需要一種比我在倫敦的隨意經

歷以及隨手閱讀幾份印度期刊所提供的，更為有系統的強化觀察。經過一段究竟應該到西印度去還是應到印度去做這份工作的不確定時期後，我決定到印度去。我在印度度過了1955年到1956年，直到1967年為止每年僅回去一次。在過去的十五年中，我一直密切掌握著印度（以及某種程度上包括了巴基斯坦和錫蘭的）知識份子的動態。

1953年，我執教於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時，經由博蘭尼（Michael Polanyi）教授（透過斯齊拉德的引薦我先前已結識了他）的介紹，我與「科學與自由委員會」進行接觸，當時博蘭尼在「文化自由協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贊助下正在規劃那個組織，〔「文化自由協會」後來由「文化自由國際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Freedom）所代替〕。透過與斯齊拉德的交往，我對科學共同體的結構發生了興趣。而麥卡錫主義者關於「秘密」的鼓譟更強化了我對科學家的興趣。

我以前對學術自由的興趣（1930年代末期，我曾就此做過一個研究），現在又增加了對尚未澄清的科學政策問題的興趣。我所關注的這個問題超出了科學研究和出版的自由，而涉及到科學選擇的標準、科學政策中的決策機制，以及科學家、政治家和公務官員在制定政策中的相互關係，因此不僅有關科學，而且還有關科學所浞及到的問題。

我在過去曾希望將《原子科學家簡訊》辦成一份專門討論我所構想的那種廣泛意義上的科學政策的雜誌，但是那些事件留下的壓力總是非常巨大，使得這個計畫不得不放棄。然而，到六〇年代初，由於約瑟森（Michael Josselson）先生（時任「文化自由協會」的執行秘書）和福特基金會的慷慨資助，我得以創辦了

《貓頭鷹》（*Minerva*）雜誌，這是一份討論包括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在內的廣義知識政策的季刊。我曾希望，並且現在仍然希望，在這份雜誌上討論其他領域的文化政策，但是卻至今尚未落實。

在五〇年代，美國知識份子對其社會中文化狀態的那種老式不滿情緒換了新的花樣。它變成了對「大眾文化」的批判。這是一種我從未抱有同情的現象。我從來就不認為觀賞電視、看卡通漫畫是受過教育者值得去做的事情，我在十五、六歲的時候便放棄了棒球，也從未接受過犯罪小說和粗俗的表演，但是我卻發現某些厭惡這類消遣的知識份子未免有點好高騖遠和過分。在我看來，那些失意的、心灰意冷的托洛斯基份子和純馬克思主義者——其中大部分人屬於法蘭克福學派的傑出份子，因為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未能達到他們那些非現實的和無人理睬的期望，便對他們忿忿不平，我因此參與了這些討論。

我曾以德國人為參照，而開始對知識份子發生了興趣。很久以來便深情地讚賞德國的大學，雖然我對它們沒有第一手的認識，但漸漸地我掌握了有關它們的知識。佛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的《英、德、美大學》（*Universities, English, German and American*），韋伯夫人關於韋伯的傳記中對德國大學的概述，布倫達諾（Lujo Brentano）的《我的一生》（*Aus meinen Leben*），威拉莫維茨—莫倫多夫（Wilamowitz-Moellendorf）和保羅森（Friedrich Paulsen）的自傳，以及多卷本的《現代科學的自我表現》（*Die Wissenschaft der Gegenwart in Selbstdarstellungen*）都誘使我熱衷於黃金時代的德國大學。我與 1930 年代的許多德國學術流亡者的接觸並沒有降低我的企羨。事實上，這種企羨在我十歲左右第一次到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中東文物博物館參觀時便開始